

与村上三次春树相遇的

宋明炜

如果时间不是线性的，如果世界的维度不止我们所见，任何人都会和任何人有机会相遇，在无数地点，相遇无数次。

“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过。”村上春树的遇到百分之百女孩的时空会充塞整个宇宙。“我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，57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女人。”王家卫定格的这个瞬间，用去年流行的一部电影标题来说，也可以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(这个片名有很多译法，“瞬息全宇宙”“全部世界同时一切”“天马行空”……“妈的多重宇宙”是我很喜欢的妙译)。

杨紫琼因此获得金球奖——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金球奖影后的亚裔女演员，第一位是三年前的林家珍。颁奖礼的黑人主持正告观众：有我在这儿是因为好莱坞记者协会过去八十年没有过一个黑人会员(因为种族族裔风波，金球奖两年前提办)。杨紫琼获奖之后的感言让全场多次大笑，却也让人感慨万千——“时光荏苒，我去年就六十岁了……”由此种种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杨紫琼的“多重宇宙”是唯一的。

在唯一的宇宙中，才有相遇，偶遇，巧遇。

纽约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巧遇的地方。我在家门口的菜场，抬眼看到斯皮瓦克(Gayatri Spivak)教授端庄地拎着篮子取西红柿，我不敢打扰，转身去拿茄子。在一个春天的午后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走着，正好在洛厄图书馆和圣保禄教堂之间，一条没有人的绿荫小径上，正对面走过来一位女士，看着眼熟，我立即认出她来了，她也看出我认出她来，脸上浮现出一个得体又显真挚的微笑，我没有停步，继续走过去。没有想到找她要签名，没有打扰她，这也是我最体面的表达。她是一位中国人都知道的大明星，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。那是二十年前，她正如日中天。那一个微笑中尽显她的善良和尊严。

香港是一个大邂逅，是一个奇迹性的相遇，这是上海作家王安忆在《香港的情与爱》中写的，其实上海又何尝不是呢？2001年夏天，我和朋友们去上海博物馆，慢慢的我走得落了单，看一个青铜器还是其他远古艺术品，余光突然看到对面的人，当时唯一的念头是：这个年轻

我的祖籍，是浙江台州。当年，父母从滨海古城考入上海就读，继而在沪工作、恋爱、成家。所以我打小就没有机会，像同辈族人一样，经历台州故地的学习生活，哪怕消磨个寒暑假。早年间，我对故乡的印象，诸如家世秘闻、方言美食和风土人情，主要来自族人口述。不过，有关口耳相传的内容，我大多不以为然。即使家谱上明白记载着历代方孝孺后裔，我也更采信正史，方氏十族应该早被明祖诛灭——通常家谱旨在光宗耀祖，往往贴金靠不住。直到父亲退休后，他收集散落松江、南汇、台州等地的史料，潜心梳理出足以自诩的世系脉络，方氏后裔似乎确有大难临头、侥幸逃脱的漏网之辈。老父依据1930年代，太叔公方策上将修订的旧版家谱，以极具学术视角的严谨态度重修，终获上海图书馆收藏归档。

祖母是方家大掌门，热情好客，她主持的大家庭位于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间，交通极便利，成为南来北往乡人们在沪中转的落脚点。每逢家乡来客，大院邻里间被毫无顾忌的嬉笑和叙旧覆盖，那便是南音里混杂北方腔的台州话。

我从小厮混在上海弄堂，小巴喇子们操一口有别近郊乡土味的沪语，但凡遇到新近抵沪的孩子，常常用童谣捉弄他们，“乡下人，到上海，上海闲话讲勿来……”其实，城里还流行着其他乡音，比如宁绍话，苏锡腔，包括最鲜活的江北

女子真美，像天使一样。我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只有最多36英寸，隔着一个玻璃罩。我认出了她是苏菲·玛索(Sophie Marceau)，她的目光也从青铜器转到我对视。那一刻发生了什么：我认出了她，我没有说话，她看出了我认出了她，她也没有说话。然后像奇迹一样，她对我报嘴一笑，像是电影里那样优雅地转身离去，身后立即围上了七八个黑衣男子，一分钟之后，这个展厅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遇到村上春树，既不是纽约，也不是上海，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厨房。那一天我在小厨房弄饮料，直觉身后有人在等，于是回过头，想说一声抱歉，但怔住了，因为我身后站着的那人，是村上春树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像是在认真地看着我，但其实又并没有在看我。我没说话，只点头向他致意。他像是才看到我，也点了一下头。我就走出了厨房。费正清中心那一层在那个时间没有什么人。我走回到办公室，也没有人。

知道村上春树喜欢波士顿，是后来看他的书。但偏偏我在波士顿之后又去了夏威夷。在瓦胡岛上，日本人很多。我中间去过一次东京，回来的飞机上，隔壁座的日本中年人，对我说他去夏威夷打高尔夫球。为什么？因为夏威夷的高尔夫球便宜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

在夏威夷，我常去一家本地的大超市，这一天(每一天都是夏天的一天)，我在超市门口，看到了那个个头不高，肤色黝黑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男人。我跟他走对面。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还是矜持住，只微微低头致意。他似乎这才看到我，直到我走过去，回头偷看一眼，他正往我这边看呢。也许他在等太太在超市里购物，不然，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让他那样一动不动站在超市门口呢？

于是我知道村上春树也在夏威夷。有一天我跟研究日本文学的乔说了这事，还告诉他我在哈佛和在夏威夷的两次偶遇。乔是我出生的时候就从哈佛毕业来到夏威夷工作的，他是一个谦虚得要命的学者，有点像我极其尊敬的韩南教授。乔不动声色地说，那我介绍你们认识吧。

于是第三次遇到村上春树，不是巧遇，而是约见。在系办公室里，村上君看到我，这次定神看了我两眼，用清楚的英语说：原来是你啊，从Cambridge一直追踪我到夏威夷啊？乔说：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，是你追踪他。

那天村上春树在夏威夷大学的露天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演讲，之前，乔先朗读了英文的《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》。轮到村上演讲，他告诉我们：我每天八点睡觉，四点起床。当时正好是八点，全场笑翻。

那天下午，我已经告诉村上春树，我要离开夏威夷了——要回到东部马萨诸塞州，去韦尔斯利学院教书了。他说：那是女校吗？只有女生吗？我说：是啊。他说：有一天我要去你的学校看一看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过了17年，他真的要来了。下个星期他就要来我的学校，担任考奈伊讲座教授，我也有幸抽签选中，成为他开设的25人的小型seminar(研讨会)的一员。今后会经常见面了。

我们在夏威夷碰面的时候，他正在北岸写作《1Q84》。他那时对我说，他总是在离开日本的地方开始写一部小说，等写到有把握了，就回到东京去完成。离开夏威夷以后不久，我就读到《1Q84》，小说写出了我们时代的恶。几年后，我在《刺杀骑士团长》中，见到了更令人恐怖的恶。

在见过村上春树君之后，我阅读他的小说，都是读的英文的，我甚至又读了此前曾用中文读过的一些作品的英文版。还是在夏威夷的时候，在那间办公室里，村上君和我闲聊着，他突然眼睛发亮地看着我，很严肃地问我：你怎么看我的小说中的中文版？在唯一的与村上春树有过三次相遇的宇宙中，我没有搪塞，说出了我诚实的看法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年，村上春树在大陆地区换了译者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巧合。

泥塘河向东流去，与幸福河交汇，交汇的地方叫大河口。我父亲在区供销社的大河口门市部上班。上初中时，我跟着父亲住在他宿舍里。初三那年，父亲调离大河口，将我托付给陈其虎老师。我就在陈老师的宿舍住了一整年。学校后来迁走了，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卖给了一家饲料加工厂，教师宿舍继续做职工宿舍。四十多年过去，那间宿舍还在。人去房空，门敞着，天花板已经朽烂。饲料厂倒闭也快十年了。中学，连同一旁的粮站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食品站，都成废墟，围墙倒塌，藤蔓丛生，老树参天。

自从镇政府搬到几公里之外的国道边上，这里就被时光遗忘了。庆幸的是，我刚好能在此找到四十多年前生活的遗迹，几排当初的教师宿舍基本没变，学校大致的建筑规模也保留了。

我是盛夏回到母校废弃的园子里的。空气中有蒸腾出来的苦艾味，各种虫子的气味，腐烂的叶子的气味，还有十多年灰尘沉淀的味道，高温让这些混合的气味都从地面向空中释放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就住在这个园子里。那时，美人蕉盛开，槐叶低垂，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井井有条，煤渣铺就的小路干净整洁。三百多名学生、二十多位老师生活在这里，热气腾腾。食堂里每天有淡淡的煤烟气、饭香味，教师宿舍里有各种炒菜的香味。

脑海里有个开关，啪嗒一下，就能让人回到往昔。何况这周遭的一切如此眼熟。给我一个下午的时间，用扫把、抹布、铁锹、水桶、石灰，我甚至能将陈老师



被蜥蜴咬伤的男孩（油画）卡拉瓦乔

选自上海博物馆“从波提切利到梵高——英国国家美术馆藏展”



乡音愁煞人

方益昉

那时正处“文革”初期，每逢香港海员抵沪，表姐就自古城现身，带我去做“电灯泡”，出入外滩的国际海员俱乐部，或者华侨饭店、国际饭店，在特许接待港澳同胞的高级场所约会。

这段童年快乐时光，影响了我一生。一壁厢，两个台州人用密码般的方言，悄悄诉说离别衷肠。另一边厢，我无法无天地大嚼西点美食，在空旷的大堂傻玩，甚至在租界时期最著名的吧台上翻跟头——在全国“一片红，破四旧”的当口，沪上竟存一缕时空，潜移默化向我灌输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很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从心理上不再抗拒家乡方言，并与其和睦相处。

真正让我对台州方言肃然起敬，是在许多年后，精读了《水浒传》，方才意识到台州文化里残留着古汉语痕迹，属于值得探究的文化遗产。比如说，袅袅炊烟这类营造灶台气氛的斯文表达，至今沿用台州方言中，日常叙事里比比皆

是。当地人将小虾米称“炊皮”，将米粉包裹菜馅上灶蒸煮的圆子，称作“炊圆”。

要知道，“炊圆”不就类似山东打虎名人之兄武大郎操办的每日生计嘛——宋代就流行于北方的大众食品“炊饼”。台州习俗还将相亲称“望大(音 duo)娘”，将筷子唤作古雅的“箸”音。这些日常细节遍布宋代代梁山泊地区，在《水浒》的字里行间高频率出现。

想象一下，穿越回归千年古城，面对市井摆摊的大娘，细姑，扯起嗓门大吼一声，“炊圆”一笼，箸一双，米酒一斤，那是何等的淋漓酣畅。仿佛来自大宋各地的英雄好汉，赶往梁山泊揭竿聚义途中，恰逢台州早市，暂且歇脚逗趣。

南宋时期，临安地区的中原文化不断向东渗透，以致台州方言演进中，明显遗传官话基因。北方元素在台州残存并汇通，一定程度与其地理特征有关。它东朝大海，延绵的四明山脉环绕其项背，西、北两侧与内陆物理隔断。所以台州人文更多海洋属性，民间信仰“落

校园北面 猪草丛生

冯渊

璃看一会，想象它放电和发出巨响的样子。但是橱窗门锁着。

陈结斌问，你想再看一次吗？

当然想咯。但是——你有钥匙吗？

陈结斌不说话，不知从哪找来一柄螺丝刀，卸下金属锁扣上的三颗小螺丝，锁扣轻轻掉下来，橱门就打开了。

他拿出那一套实验仪器，我的心狂跳。

我们照着陈老师的样子，接好电池，关闭电灯，又做了一次放电实验。电闪雷鸣。惊心动魄。

就那一次。我没敢再做这样的实验，放电会大量消耗电池的电量，万一哪天陈老师拿到别的班级做实验没电了，多不好。但是，橱子里好玩的东西多了，砝码、天平，还有我最迷恋的电铃。今天想起来，那不过是缠着线圈的铁架子上绑了一个铜铃，很寒碜的样子，但只要接上五号电池，它就会铃铃铃地不断发出声来。有整整一个学期，我都在想着怎么自己造出一台电铃来。我知道原理，最难的是电刷，我的手工做不出来。

我学会了用螺丝刀卸锁扣，趁陈老师和陈结斌不在的时候，我拿出电铃，玩一分钟，再拿出天平，称量一下作业本和一支钢笔的重量。

然后，销毁罪证，小心将一切复位。再用螺丝刀旋上三颗螺丝，锁好橱窗门。

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，直到有一天，陈老师站在橱子前大骂。他没有指名道姓，甚至没有明说骂什么，骂完也并没有换锁换扣。我跟陈结斌都耷拉了脑袋，陈结斌知道是我后来干的好事，他没说话，我再也不敢造次。

陈老师每周二睡在宿舍，我们就特别乖，写好作业，规规矩矩入睡，早上铃声未响陈结斌就喊我起床，赶在陈老师起来之前洗漱完毕去早读。

其他日子节奏明显舒缓得多。一天晚上，我不知从哪找到一片“瓜粉”，这是一种早就从市场上消失的东西，回想起来，有小圆饼干大小，一指厚，我猜大概是滑石粉一类的东西，几分钱一片，比痱子粉爽身粉便宜。洗过澡，涂在蚊虫叮咬过的肚皮上、手臂上、腿上。夏天皮肤晒得黑，瓜粉涂出一道道白痕，像一只花猫。

那天晚上我突然奇想，将瓜粉搓碎，白色瓜粉在掌心特别细腻，毫无尘泽，涂在脸上，镜子里就出现了一张戏台上才能见到的白脸。我又无师自通，找来红墨水涂红嘴唇，咿呀呀哼唱起来。那时候，我们正学到鲁迅的《社戏》。

同学趴在窗户上看，玻璃亮闪闪的，灯光明晃晃的，十二岁的我在里面走来走去，学那个站起来又终于坐下去的老旦。同学的呼喊使我更兴奋，闹得很晚他们才散去。

我没有洗澡，也没有和陈结斌睡在一起。我太累了，太开心了，倒在陈老师的床上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陈老师喊醒了我，你发烧了吗？怎么嘴唇通红？你怎么睡到我床上去了？

我吓得一骨碌爬起来。我在被面上睡了整整一晚，原来只是想躺一小会儿，谁知就睡过去了，一睡就睡到第二天早晨。那是我睡得最沉的一夜。八个小时就像八分钟，什么梦也没有，醒来的姿势和头天晚上倒下去的样子一模一样。

有些片段从时光之海里凸显出来，就像大海里的岛屿。中间弥漫的海水低伏着，仿佛不存在。盛夏的正午，我在荒原里徘徊，为什么想起的是这些，

寇”文化，开放但向往稳定，冒险又盼望认可，绝非简单套用海盜式粗鄙可随意加以定论。

几十年后，我移民北美，落脚纽约，切切实实成了外乡人。一次，我在唐人街闲逛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久违的台州对话，语调极其熟悉，又似乎有些异化。从小在上海大街上都难得听闻的乡音，明明白白飘浮在西半球空中，太令人意外了。立即即锁定发音来源，只见一群中年男女，正进入路边一家不起眼的杂货店。

为一探究竟，我也随之踏入店内。一幅匾额赫然上空悬，“纽约地区大陈岛同乡联谊会”。原来冒险与勇毅的台州文化，早已传播定居北美。近年我常返沪省亲，试图寻回儿时的味蕾记忆，但只能去昂贵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新荣记，方得品尝正宗台州美食。环顾此店，四周布满蜜桔、麻薯、光饼、炊圆、食饼筒、麦裹头、咸蜆鱼等故乡特产，物美价廉，应有尽有。

台州落寇式特征，多少遗传于我，冒险海外置产并登报招租。某日，有台湾同胞上门看房，我判断来者收入不稳，且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待抚养，并非理想客户。正想下逐客令，忽闻夫妻俩用台州方言商量，如何向我解释租房需求。又是台州大陈岛！恰似内心深处突然亮起一盏电灯泡，穿透预设的出租止损防线。我无力再固执成见，租！

而不是另外的往事呢？

记忆靠得住吗？我在书写往事的过程中有没有臆想的成分，有没有修饰或者掩饰了什么？由于没有印证，即使我本着坦诚叙写的姿态，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夸大其词。如果我，陈结斌和陈其虎老师一起回到这里，回忆起的往事会是什么样子？

我十三岁离开这里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现在，他们应该就生活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，怎么找到他们？找到了，他们有什么兴致一起来这里看看吗？天这么热。陈老师应该八十多岁了。

我还是一个人随便走走。

从宿舍往东北方向走，现在是一排重建又废弃的厂房，里面有菌菇培养基，棉籽壳、麦麸、牛粪，堆成狭长的一道长廊。零星几只土蜂飞来飞去，估计这里已经没什么营养了。多年以前，我就坐在这些牛粪堆的位置上课。那时，这里是两排窗明几净的、快乐的教室。我个头小，坐在教室第一排，坐的是从父亲供销社带来的一把竹椅，往后一靠就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念名字和分数。念到我，98，我往后一靠，心想，哪里扣了两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盘手盘脚蹲在竹椅上继续想。老师一径念下去，张寿一，38。哈哈哈哈哈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椅子发出欢快的吱扭声。

晚上，陈结斌对我说，张寿一考得不好，肯定很难受，你还笑话他，这样不对；你取得了好成绩就骄傲，也不对。我很委屈。我绝没有嘲笑张寿一的意思。张寿一比我还至少大四岁，我们玩得很好，他有一本《木偶奇遇记》，我借回来看了不下一百回。每晚临睡前在枕上翻阅，是最开心的时刻，觉得自己就是匹诺曹。让我发笑的是这个分数，而不是人。我没有考虑到是谁得了这个分数，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了不起。

你就是骄傲。陈结斌抬高了声调。我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现在想来，我真的不是骄傲。

是纵奴。

从废弃的厂房走出来，前面有口水塘，是当年盖教室之前挑土垫高宅基挖出来的。塘水很清，同学吃过饭都在里面刷碗。我也刷碗。几条小鱼游过来，吞食碗里的饭粒和飘起来的油星，我想顺手捞上几条，碗一出水，它们滋溜一下就没了影。如是者三，我一恼火，用力将碗扔到水塘中央：见鬼去吧，你们这些狗鱼。

扔出之后我就觉得似乎不妥。但旁边的同学呼喊起来，一片叫好。信用社徐会计的儿子说，太了不起了，这个碗在水面形成了一道弧线，它的圆心角是135度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
哼，多少度我都能扔出来。明天给你扔一个90度的。

此后十多天里，我大概往水塘里扔了七只碗。碗是趁师傅不注意从学校食堂拿出来的，是那种镀金边的白瓷菜碗。

没有人重复这种奢侈的行为，我也全不考虑承担任何后果，连着做餐后的精彩表演。直到学校食堂的屠老——这是一个脸上长着肉瘤的老头，满脸杀气——在我最后一次拿碗的瞬间，用铁钳一样的左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右手顺便在我脑袋上狠很箍了两个暴栗。我知罪，一溜烟跑了。

水塘没有了。眼前是一堆倒伏下去仍勉力生长的树，横七竖八攀附在一起。我看到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像一只小兽，在荆棘榛莽中上蹿下跳，呼吸植物吐露的芬芳，再强烈的阳光也是沁人的凉润，小兽的眼里只有欢乐。

蒸腾的暑气把廉价的感伤降到最低。我首先要应付奔流的汗水，还要留心脚下倒卧的大树，突然出现的半截墙根。园子深处有一间瓦房，这样的小瓦极少见，瓦缝参差，大概只有这里还保存着，一棵大树断了头，半个身子压在房顶，瓦片陷下去，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，里面积满了枯叶。

大树临死前将房顶压塌，但似乎正是它的身躯支撑了摇摇晃坠的房子。无人问津，一切都随它们和风雨的便。饲料厂取代了当年的校园，它的倒闭，又将校园和往事封存时光里。校园和工厂互相掩蔽，支撑起小小的空间，让我在这里开启了通向往昔的门扉，仿佛轻轻掀下一个按钮，我就能看见校园广播室里那架蓝盈盈的电唱机上，黑色的胶木唱片正在转动，熟悉的《打猪草》的歌声，从树叶笼盖的高空传来：

(男)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芽。
(女)么杆子么叶？
(男)开的什么花？
(女)结的什么籽？
(男)磨的什么粉？
(女)做的什么把？
(合)此花叫做(呀得咿得喂呀——得儿喂呀——得儿喂呀——得儿喂的喂上喂)叫做什么花？

我们一听到“得儿喂的喂上喂”，就大笑起来，在校园里奔跑，瞬间变成了打猪草的男孩和女孩。

学校没有围墙，教室后面就是花生地，猪草在地头泼喇喇生长，无边无际。